

第二章 最先抵达岭南的甯氏祖先

甯氏家族的先祖何时来到岭南地区？他们进入岭南地区之前又曾在什么地方停留过，在历史文献中没有只字记载，致使后来的史家对岭南甯氏家族的来龙去脉如坠五里雾中，难识其真面目。因为不知其根源，后人就想当然地说他们来源于当地的少数民族。据《甯贇墓志铭》和《甯道务墓志铭》记载可知，甯氏家族的先祖最早是在南北朝梁武帝时来到南定州任职的，陈朝时期转到安州（钦州）任刺史职。

第一节 立足定州

一、定州刺史甯逵

关于广西钦州甯氏家族的始祖，据《甯贇墓志铭》载：“祖逵，驰千载仁风，拥六奇高辩，训说过庭。梁武皇帝除定州刺史，总督九州军事。陈宣武帝授安州刺史。”据此，甯逵是我们目前所知道的广西甯氏家族最早的始祖，也是甯氏家族在钦州立脚创业的第一人。甯贇是甯猛力的儿子，甯逵的孙子，相距不远，相信甯贇生前曾见过其祖父。因此，碑文所记甯逵曾当过定州刺史应是可信的。但是否是在梁武帝时当定州刺史？则有待进一步考证。

梁朝是萧衍所建立的南方小朝廷。萧衍（464~549年），字叔达，小字练儿，南兰陵中都里（今江苏常州西北）人，南齐宗室，官至雍州刺史，镇襄阳。永元二年（公元500年），萧衍之兄萧懿被南齐东昏侯萧宝卷杀害；三年，萧衍乘南齐君臣互相残杀，政局极端混乱之际，自襄阳举兵东下，攻占建康（今南京），并于次年称帝，国号梁，建元天监，历史上又称萧梁。梁朝统治共五十六年，萧衍在位长达四十八年。萧梁时期，更注重门第观念，官吏基本上是世袭加推荐两种形式。所以，要想当官，特别是刺史一级的官吏，家族的背景尤其重要。不是名门大族的人，如果想做官是非常难的。甯逵被萧梁政权委任为定州刺史，没有一定的社会背景和政治背景，是绝对不可能的。定州是什么时候建立的呢？据《南史·武帝纪下》载：普通四年六月“分交州置爱州，分广州置成州、南定州、合州、建州”。文中的南定州后来又称为定州。普通四年是梁武帝的年号，即公元

523年。南定州原属广州管辖，梁武帝登基后发现广州辖区过大，不利于管理，于是另外分出4个州。

定州州治在什么地方？定州统辖的地域有多大？这是我们要深入讨论的问题，因为它涉及甯氏族家族始祖甯逵的身份、地位、权力和威望问题。据《新唐书·地理志》载：“贵州怀泽郡，下。本南定州郁林郡，武德四年曰南尹州，贞观八年曰贵州，天宝元年更郡名。土贡：金、银、铅器、纁布。户三千二十六，口九千三百。县四：有府一，曰龙山（贵县北五十里）。郁林（玉林市兴业西北六十里），中下。怀泽（贵县西南），下，武德四年置。潮水（贵县西），下，武德四年析郁林置。义山（贵县西北），下，武德四年更马岭县曰马度。贞观后省，天宝后更置，曰义山。”^[1]其中的“下”“中下”是什么意思呢？这里稍作说明。隋唐时期，地方上有州（郡）、县两级建置。州、县均按其地位的轻重、辖境的大小和户口之多寡以及经济开发水平的高低分为上、中、下三等。三万户以上为上州，二万户以上为中州，二万户以下为下州；五千户以上为上县，二千户以上为中县，一千户以上为中下县，其余为下县。按照这种标准，定州及其下属四县都属于下等州、县。这主要是根据当时的户口情况来定的，也就是说，定州的户口不足2万户；4个县中，除郁林县的户口为1000多户之外，其余潮水、怀泽、义山三县，每县都在1000户以下。现在的玉林市和贵港市当时属于定州的辖区。

又据《旧唐书·地理志》载，“石南，州所治。汉郁林郡之地。梁置定州，隋改尹州，炀帝为郁林郡，皆治于此。陈时置石南郡，隋改为县也”^[2]，可知梁朝的石南县就是定州州治所在地。据考证，梁朝石南县故址在今玉林市兴业县东北。^[3]至于梁朝定州的管辖范围有多大，广西壮族自治区通志馆编《二十史广西资料辑录》的《隋、唐、五代广西古今地名对照表》指出：“南定州，梁朝置，后为定州，南朝陈因之，隋改为尹州大业初改为郁州，辖境相当今南宁、玉林、横县、宾阳、贵港、桂平等市县。”上述地方，河流交错，地势相对平坦肥沃，气候宜人，雨水充沛，人口众多，是当时广西最富裕的地方。甯逵在此等地方担任最高行政长官，显然是得到梁朝皇帝的特别器重。

甯逵从什么地方来定州任刺史，史书没有记载，两块墓志铭也未说及，因而

无法考证。而甯逵什么时候到定州任刺史？则可从一些文献资料中作出推测。据史书记载，甯逵到定州任刺史之前，定州就已建立，当时的刺史是萧勃。据《南史·简文帝纪》载：大宝元年（公元550年）十二月：“以定州刺史萧勃为镇南将军、广州刺史。”由此可知，在梁简文帝萧纲以前，萧勃仍是定州刺史，所以《甯贇墓志铭》说甯逵是“梁武皇帝除定州刺史”，应当有误。因为梁武帝在公元549年已死，甯逵不可能是梁武帝在世时当定州刺史。估计是萧勃从定州刺史升任广州刺史后，甯逵方接其任。也就是说，甯逵最早也是在大宝元年（公元550年）才能接任定州刺史。

定州在岭南地区是个非常重要的州，这里不但是物产丰富，同时还是军事重地。历代皇朝都委任有才能且忠信的人物来这里担任行政长官。这点从前任定州刺史的出身情况来看，便可知定州刺史职位的重要性，同时也可了解甯逵在梁朝受信任的程度。据《梁书·元帝纪》、《梁书·敬帝纪》和《南史·萧勃传》记载：萧勃是萧景之子，属梁宗室。萧景是梁武帝叔父萧崇的儿子，梁武帝的堂弟。少年时好学，长于辞令。齐时曾任永宁令，政绩显著，史称“政为百城最”（《南史·梁宗室传》）。齐永元二年（公元500年），封步兵校尉。萧衍代齐建梁后，封他为吴平县侯、南兖州刺史，加都督。后历官领军将军、甯蛮校尉、雍州刺史、侍中、安西将军、郢州刺史等职。他勤于政事，颇负盛名。梁武帝对他极为器重，“军国大事告与议决”。普通四年（公元523年）卒于郢州治所江夏郡城（今湖北武昌西南黄鹤山上），时年47岁。梁武帝诏赠侍中、中抚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曰忠。萧景死后，初葬于江夏，后迁葬建康（今南京），墓冢至今还在。

据上述可知，萧勃是梁武帝的堂侄子。梁朝建立时萧勃被封为曲阳乡侯，并被任命为定州刺史。梁太清三年（公元549年），侯景作乱，当时的广州刺史元仲景欲响应侯景，为都护陈霸先所杀。陈霸先迎萧勃为广州刺史。其时湘东王萧绎承制，但尚未控制局势，只能承认此事，便于大宝元年（公元550年）以勃为镇南将军、广州刺史。后萧绎平灭侯景，天下初定，便以萧勃为晋州刺史；至承圣三年（公元554年）十一月，江陵陷落，元帝崩沮，勃又复为广州刺史。承圣四年（公元555年）二月，敬帝承制，以广州刺史萧勃为司徒；绍泰元年（公元

555年)十月,以司徒勃为太尉;太平元年(公元556年)十二月,进太尉、镇南将军勃为太保、骠骑将军。太平二年(公元557)二月,梁曲江侯萧勃在广州反陈霸先,举兵北伐。过五岭至南康(今属江西),以郢州刺史欧阳颢及其部将傅泰、萧孜(萧勃侄子)为前军,至豫章,分屯要点:欧阳颢屯苦竹滩(今江西丰城西南),傅泰据蹠口城(今江西南昌南)。南江州刺史余孝顷在新吴(今江西奉新西)举兵响应萧勃,以其弟余孝劭守郡城,自率军出豫章据守石头,与萧孜会合。陈霸先派平西将军周文育率军进击。周文育至豫章后,即以军主焦譙僧度袭击余孝顷,尽夺其上牢所泊船只,于豫章立栅固守。周文育军粮尽,诸将欲退,文育不许,遣使送出临川(今江西南城)内史周迪。周迪允送粮食。于是周文育以旧船运老弱,顺流而下,烧豫章栅栏佯退。余孝顷见之,不设防备。周文育军由小路日夜兼程,占据芊韶(今江西丰城东北)。芊韶上游有欧阳颢、萧孜,下游则有傅泰、余孝顷、周文育据中筑城,切断敌军联系。欧阳颢等人大惊,退入泥溪(今江西新干西南)。周文育派严威将军周铁虎等袭俘欧阳颢。又派其将丁法攻俘傅泰。萧孜、余孝顷军闻讯退走。三月,萧勃在南康得知欧阳颢等兵败,军中惊慌,其部将陈法武、谭世远于始兴(今广东广州韶关北)斩杀萧勃,持其首级降梁。

从上述材料可知,萧勃是梁朝重量级的皇亲国戚,长期担任定州刺史,以后才升任广州刺史,说明定州在岭南地区的地位仅次于广州。甯逵得以任定州刺史,除开其本人的才能外,或许还与梁朝廷有着某种特殊的关系。

二、从侨置定州看甯氏族人的社会背景

玉林石南旧称定州,最早又叫南定州,实际上是南北朝时期的侨置州。真正的定州在北方,即现在河北省的定州市。原来,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分裂成南北两半。当时的北方是五胡十六国,都是少数民族统治。西晋司马氏政权被迫向东南迁徙,定都南京,史称东晋。在东晋南朝时期,北方汉人大量南迁,成为流民。为了应付大量南下的汉族移民,东晋南朝政权在流民聚居之地,以流民原籍之州、郡、县的名称设立临时性地方行政机构,进行登记和管理,并以流民中的大族担任刺史、太守和县令。这些寄寓于新居地的州、县,叫做“侨置州、县”。

《隋书·食货志》云：“晋自中原丧乱，元帝寓居江左，百姓之自拔南奔者，并谓之侨人。皆取旧壤之名，侨立郡县，往往散居，无有土著。”《宋书·州郡志·序》亦云：“自夷狄乱华，司、冀、雍、凉、青、并、兖、豫、幽、平诸州一时沦没，遗民南渡，并侨置牧司，非旧土也。”侨置郡县原意本是寄寓，并无实土，侨州郡县的户籍亦只属于临时性质，著籍者可享受免除徭役的优待。由于侨州郡县数目繁多，所以在行政管理上造成诸多不便，行政区划和统属关系都十分混乱，但在当时的战乱形势下，侨置州县一方面便于控制人口，使流民寓居变为合法；另一方面也稳定了统治秩序，可以说是最佳的权宜之计。

东晋南朝时，不仅广西地区出现侨置州，就是远在越南南部的驩也有侨置州。《新唐书·地理志》云：“驩州日南郡，下都督府。本南德州，武德八年曰德州，贞观元年又更名”北方的德州在今山东省陆县，而在今越南南部也设南德州，说明南北朝时期，北人也曾侨居越南南部地区。

早期的侨置州，可以说是虚设的，没有实土，北方人仅是寄寓。如晋元帝司马睿南迁时，琅邪人民随司马睿过江者一千多家，元帝在太兴三年（公元320年），侨立怀德县于建康（南京市），以安置这些琅邪侨民。成帝司马衍咸康元年（公元335年），又在江乘县（今江苏句容县北六十里）境内侨立琅邪郡，为了和北方的琅邪郡区别起见，称为南琅玕郡。北方的琅邪郡有临沂县，于是南琅邪郡领邑下也侨立临沂县（在江乘界内），这可以算是侨郡县的创始。当年的建康郊县，人口众多，本来就有郡县，在此设侨置郡县，又没撤销原来的郡县，就变成了“郡中郡”和“县中县”，政权仍掌握在原来郡县行政长官手中。东晋晚期至南朝初期，推行了“土断”政策，才改变了侨州县虚设的状况。土断的主要精神是划定州、郡、县领域，居民按实际居住地编定户籍，故称“土断”。推行、落实“土断”政策的侨置州县，在形式上并没有改其侨置的性质，而是侨民的身份有了质的变化，他们由原来的寄寓变成了主户，大大方便了南朝政权的行政管理和收缴赋税。

甯逵在梁时任定州刺史，此时的定州已不是虚设的侨置州，甯逵是握有实权的刺史。很明显，甯逵是有一定的社会背景和政治背景才能当上定州刺史。因碑

文及史书中都没提到此方面的问题，我们只能从其他旁证材料来探讨这个问题。一般来说，当时的北人南迁都是拖家带口，举族行动，单家独户南迁的很少。长途跋涉，万分艰难。又兵荒马乱，迫使人们要有组织地行动；老弱妇孺沿途死亡，父兄子弟希望白骨得到安葬；道途之上，人们需要粮食、衣物与医药。若遇到劫匪土豪欺负，没有团结一致的集体力量是不行的。此时，地方豪族与将帅固有的势力与影响就发挥了作用。

汉魏以来，因长期战乱，北方人民多聚族而居，社会经济的基本单位，是一个个名宗大族。当社会动乱时，人们更注重宗亲之间的裙带关系。《宋书·王懿传》云：“北土重同姓，谓之骨肉，有远来相投者，莫不竭力营赡；若不至者，以为不义，不为乡里相容。”同书《索虏传》也说：“河北士人，虽二三十世，犹呼为从伯从叔。”这种厚家族、重亲亲、倡孝友的传统，不仅体现在平时的交往当中，更显现在避难途中。例如范阳人（今河北省涿水县）祖逖，是当地的世家大族。他“轻财好侠，慷慨有节尚，每至田舍，辄称兄意散谷帛以赈贫乏，乡党、宗族以是重之。及京师大乱，逖率亲党数百家避地淮泗，以所乘车马载同行老疾，躬自徒步，药物衣粮与众共之，又多权略，是以少长成宗之，推逖为行主。达泗口，元帝用为徐州刺史，寻征军咨祭酒，居丹徒之京口”。（《晋书·祖逖传》）由于祖逖在“率亲党数百家避地淮泗”途中赈危济贫，以车马、药物、衣粮“与众共之”，加上他“又多权略”，能给随行者以军事性庇护，所以很自然得到大家的拥护，被推为“行主”，成为这一带有浓厚宗族乡里色彩的流徙集团的领袖。

宗族系统是以家庭为单位组成的。由于各个家庭之间，有着亲疏、贫富的不同，分属于不同的阶级、阶层，因而宗族纽带并不是很牢固。但在流徙过程中，大家“戮力一心，同恤危难”，就加强了一个个家庭之间的联系，使得宗主与族人的关系愈加密切，加强了主从关系。另外，还有一些其他宗族的同乡人或散户，他们缺乏自保能力，只好依附于势力强盛的集团而随行，这就使得流徙集团不断扩大；等到定居他乡，又有“主客矛盾”的问题，即后到的流民（客）与原先的当地居民（主）发生的矛盾。后到的客人欲求立足，欲保安全，就更加需要倚仗宗主与集团的力量。这样，宗主、豪族与所谓宗亲、乡党、部曲、门徒、义附等

人群，就逐渐结成为牢不可散的坚固整体，我们可称之为“乡族集团”。乡族集团与迁徙前的宗族系统，内部结构基本保持着一致；其领袖人物多是有势力的大族、将帅，下面有各级小帅起辅佐作用，这就如同军众有部曲督将、乡里有三老里吏。以领袖——小帅为核心、以宗族乡里为主体的这种流徙集团，势力是很大的。因此，南朝历代朝廷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必须依靠这些有势力的宗族集团，委任他们为各州县的行政长官。

由上所述可知，那些来到岭南地区的乡族集团，势力也是很大的。如高州地区的冯氏家族，其先祖冯业就是从北方带了 300 族人来到岭南地区的。甯逵带了多少人来到定州定居，目前还没有确切的资料证明，但从隋唐时期甯氏家族的势力情况看，其人数不会比高州冯氏家族少，因为当时定州的人口、经济、地理位置远胜于高州，梁朝必委任势力强大的北方士族领袖来此任刺史，否则就很难统治当地的越人。据此推测，甯逵当年也应当带有数百人左右来到定州。

南朝在南方地区设侨置州县，几乎都是用北方士人任行政长官。这就为我们了解甯逵的族属提供了充分的依据，如果说甯逵是当地的少数民族，他只能在桂西地区的羁縻州当刺史，绝对不能当侨置南定州刺史。因为，侨置州的设置有其非常复杂的政治背景。南京大学历史系胡阿祥教授曾经研究过东晋南朝的侨置州县，综合他的观点和我们的认识，^[4]可将南朝在南方地区设置侨州、郡、县的目的概括为如下几点：

(1) 维护正统观念，巩固统治地位。所谓“正统”，正如欧阳修在《正统论》中所说：“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这关系到民心向背的大问题。因此，在中国历史上，历代历朝都非常重视正统地位，不管当政者是哪个民族，都要把自己的政权标榜为“正统”，以便得到全国人民的认同。特别是在国家分裂、诸侯割据时期，统治者都千方百计争夺“正统”，成了一种普遍现象。南北朝时期，南、北的统治者就为“正统”问题争得不可开交。北朝政权因为占据着传统帝王京畿的中原地区，就凭着这种地理优势而以正统自居，骂南朝为“岛夷”；东晋、南朝政权则凭借传统文化和民心所向的优势，也自认为正统，指斥北朝政权为“索

虜”。从当时的民心而言，东晋和南朝因为拥有皇统继承或禅让以及大批中原士族豪强跟随，正统观念自然深入人心，正如李焘《六朝通鉴博议》卷一所云：“若夫东晋、宋、齐、梁、陈之君，虽居江南，中国也；五胡、元魏，虽处神州，夷狄也。”就是北朝的官员，也有以南朝为正统的，认为东晋、南朝“虽僻陋吴越，乃正朔所承”。（《晋书·苻坚载记附王猛传》）《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太元七年记前秦苻融谏苻坚曰：“国家本戎狄也，正朔会不归人。江东虽微弱仅存，然中华正统，天意必不绝之。”

在“正统”思想的指导下，东晋、南朝在南方侨置的州、县，均以汉民迁出前北方老家的郡县为名，而绝不以十六国、北朝新立的州郡县为名。这一方面表示正统所在，表明对北方政权的否定；另一方面则表示打回北方老家，收复失地的决心。

(2) 怀念故土情结，慰藉南来民心。北方人民拖家带口，离开故土故园，成为国破家亡的流民。他们来到陌生的南方生活，难免有怀念故土的情结。南朝政权在他们居住地设置侨州侨县，使他们仍有居住在北方旧州县的感觉，永远怀念自己祖祖辈辈居住的地方。

(3) 招诱北方人民，壮大自己队伍。在中国古代，人口是经济与军事极为重要的因素。人口的优胜往往就是经济与军事的优胜。而当分裂之世，各政权为争取兵源与劳力计，一般也必须吸引并保持流民，使之不为敌资。具体到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东晋南朝的人口较之十六国、北朝人口要少得多。在这种情况下，从根本上说，东晋南朝政府是乐意接受侨流人口的。而除了主动迁移入南者外，政府出于增加人口与安边的需要，也必须致力于招诱边民。招诱边民的主要措施之一，便是设立侨州郡县。有时是先侨立某州、郡、县于南方，然后招引北土此州、郡、县人民，其用心可谓良苦。由于这一策略顺应了人们心理之共同所眷，故颇起招徕之功。据《宋书·索虏传》元嘉二十三年（公元446年）记载，因南朝“不依城土，多滥北境名号”侨置州郡县，招引来大量北方人民，曾经引起了北魏地方政府的恐慌，便移书南方政权，要求他们“不因土立州，招引亡命”。南朝地方政府也严词加以反驳：“夫古有分土，而无分民。德之休明，四方襁负。

昔周道方隆，灵台初构，民之附化，八十万家。彼不思弘善政，而恐人之弃已，纵威肆虐，老弱无遗。详观今古，略听輿诵，未有穷凶以延期，安忍而怀众者也。若必宜因土立州，则彼立徐、扬，岂有其地？”据此可知，东晋、南朝的侨置州、县，确有“以地招人”的召引力。

(4) 安抚迁徙流民，促进当地生产。侨流人口为侨州郡县所安置，又转而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这集中体现在地区的开发上。南北朝时期，北方中原地区长年动乱，人民流离失所，生活极端困苦。而包括定州在内的岭南地区战事不多，人民得以生息休养，许多北人纷纷南迁岭南定居，与当地越人和睦相处，过着和谐的田园生活。梧州市南朝墓出土的陶瓷、玉石器，很鲜明地反映了上述历史内涵。如梧州出土晋墓墓砖铭文有“永嘉世，天下灾，但江南，皆康平”、“永嘉世，天下荒，余广州，皆康平”。另外，还出土有以牛犁田模型。牛耕技术是从北方传到岭南地区的。牛耕造就了大量的物质财富，造就了地主阶层和农民阶层，造就了封建的雇佣生产关系。

甯逵率领族人从北方山东来到南方时，最早很可能在别的地方停留过，以后才到定州任刺史。《甯贇墓志铭》文载：“公匡衡在辅，无忘士口之工，从而能政，追踪子范之用，所以繁衍陵穆，盘根闽越者哉。”文中的“闽越”，是古代百越的一支。越人分为很多支系，在广西称为西瓯、骆越，在广东称为南越，在江苏、浙江称为吴越，在福建称为闽越等。这段铭文即是说，甯逵在南朝政权中，一直为朝廷效力，怀有士族传统忠效之心，政绩非常显著。他还向齐人子范学习孝道，所以能续延甯姓宗脉，繁衍在福建越人地方之中。该墓志铭的后半，还有赋辞，其中有“令美闽越，德隆蕃邸”之句，意思是说，甯逵在闽越政绩很好，得到当地越人和南迁汉人的赞美，在那里还建有非常豪华的官署。据此可知，甯逵及其族人在来到定州之前，曾经在闽越停留过一段较长的时间。可惜的是，该墓志铭没有说明：甯逵在福建省哪个地方落脚？任什么职务？又因为什么原因来到定州？尽管有这些遗憾，但也不可苛求于前人了。

第二节 钦州开基业

据《甯贇墓志铭》载：甯逵“陈宣武帝授安州刺史”。为什么要将甯逵从定

州（今玉林市兴业县）调到安州（今钦州市）任刺史？这是改朝换代的变动。我们先来了解其历史背景才能明白个中原因。陈宣武帝即是陈朝开国皇帝陈霸先。陈霸先（公元503～公元559年），字兴国，小字法生。浙江长兴人。陈霸先的远祖是东汉晚期太丘县的县令陈实，世居颍川许县（今河南许昌东）。陈霸先因出身寒门，起初先担任过里司、油库库吏，不久，担任了新喻侯萧映的传令吏。

萧映是梁武帝的侄子，历任吴兴太守、北徐州（州治在安徽凤阳东）刺史、给事黄门侍郎、卫尉卿等职。大约在梁大同六年（公元540年），萧映到广州任刺史。作为幕僚的陈霸先随任为广州府中直兵参军，不久又出任西江督护、高要太守。第二年，交州（治所在今越南河内市东北约三十公里处）土豪李贲发起叛乱，赶跑了交州刺史萧咨。大同八年（公元542年）春，梁武帝遣将讨伐，林邑国（今越南南越）国王也从腹背袭击李贲。大同九年（公元543年）四月，李贲部将范修在九德（今越南荣市）大破林邑王，梁征讨诸军也不知所终。李贲控制了整个北越，就在梁大同十年（544年）正月仿梁朝制度，设置百官，自称越帝。梁武帝又命新州（治在今广东新兴）刺史卢子雄、高州（治在今广东阳江旁）刺史孙同火速出兵，并受坐镇广州的萧映和萧咨节制。当时南方正是春暖草长、瘴疠肆虐的季节，卢、孙二将请求待秋凉后发兵，但二萧不允，催命出征。卢、孙二将只好领着将士匆匆上路。才行到合浦，果然疫气发作，死者达六七成，趁机溜掉的也不少，一支征讨大军不战而溃。梁武帝接到萧咨密报，误以为卢、孙二将私通李贲，故意逗留不进，敕令在广州赐死。这事激起了卢子雄部下旧将周文育、杜僧明等人的不平，于当年五月发动哗变，叛兵包围了广州城，准备捉住二萧，血祭卢、孙二将，然后赴京请罪。一天工夫，广州城外云集叛兵数万，广州告急。陈霸先在高要闻报，率三千精兵，日夜兼程，火速救援，一战而解重围，周文育、杜僧明等叛将被擒。陈霸先牛刀小试，已显露出英武雄奇的将略之才。这事惊动了朝廷，梁武帝还特派画师前往广州，画下陈霸先像，以示表彰。梁大同十年（公元544年）冬，萧映在广州病亡。新年刚过，陈霸先护送萧映灵柩回建康，行至大庾岭，正遇上梁武帝诏命下达，任陈霸先为交州司马，领武平（今越南永安附近）太守，随新任交州刺史杨日票前往交州讨伐李贲。陈霸先又返回

广州，召聚将士，备办军资。陈霸先与杨日粟等征讨大军于大同十一年（公元545年）十二月抵达交州。在恶劣的环境中，经过三年苦战，终于除掉了以李贲为首的地方分离势力，收复了交、爱、德、利、明等数州（约今北越全境）。整个交州平叛过程，杨日粟虽然“领衔主演”，真正的核心人物却是陈霸先，他所统领的军队，实际上是交州平叛的中坚力量。但由于当时社会极讲究家世出身，功勋卓著但出身贫寒的陈霸先仍未受到朝廷重用，交州平定后，依然被任命为西江督护、高要太守，连一个刺史都未升上，只添了一个督七郡诸军事的军职。陈霸先领着本部将士返回高要复职时已是梁太清二年（公元548年）。

大宝二年（公元551年）十月，侯景残杀梁简文帝萧纲，并于十一月自立为皇帝。大宝三年（公元552年）正月，陈霸先南路征讨大军从豫章（今江西南昌）出发，这时已有甲士三万人。陈霸先与西路都督王僧辩会师后，于三月在建康与侯景展开了大决战，终于彻底摧毁了侯景势力。萧绎就在江陵称帝，即历史上的梁元帝。陈霸先奉命镇守在京口（今江苏镇江），王僧辩镇守在建康。承圣四年（公元555年），北齐乘梁国多次遭遇兵祸之机，派兵南向，护送贞阳侯萧渊明来登梁国帝位，企图培植傀儡皇帝。王僧辩屈从北齐压力，于七月迎萧渊明到建康称帝。陈霸先出于国家民族利益，九月，在京口举兵，除去王僧辩，把萧渊明赶下台，萧方智登基称帝。陈霸先任大都督，总摄梁朝军国大事，分别于绍泰元年（公元555年）底和太平元年（公元556年）六月，先后击溃北齐两支武装力量的大规模进犯。陈霸先于太平二年（公元557年）取代梁称帝，史称陈朝。陈霸先在位三年，任贤使能，政治清明，江南局势渐趋稳定。公元559年六月，陈霸先病逝；同年，陈朝被隋朝所灭，前后历陈武帝、陈文帝、陈废帝、陈宣帝、陈后主共五代王，共计32年。

陈霸先在梁朝时曾出任西江督护、高要太守，可说与甯逵同朝为官。玉林石南位于西江上游，与陈霸先辖地相邻，同饮一江水，相信陈霸先与甯逵是相识的。或者说在陈霸先两次平息交州之乱时，甯逵也应率部参战，或是筹集粮草。陈朝建立，陈霸先虽身居皇帝至尊，还是念旧时交情，委任他以刺史之职，但却换了个地方，由定州刺史改任安州刺史。按当时的情况而言，定州辖地面积大，有十

二个县；人口众多，有五万九千二百户，经济条件好。安州辖地小，只六个县，人口少，只有一万二千六百七十户，经济条件差，有相当多的土著越人还没有编籍入户。陈霸先委任甯逵为安州刺史，一方面防止他在定州盘根坐大，另一方面是希望他开拓新区，为朝廷多贡赋税。

陈时甯逵新任刺史的安州，也就是后来的钦州地区。秦始皇统一岭南时，钦州属于秦象郡所辖。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设合浦郡和合浦县，钦州地属合浦郡合浦县。南朝萧梁普通四年（公元523年）置安州。这是钦州最早作为州一级的建制。《隋书·令狐熙》云：隋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熙以州县多有同名者，于是奏改安州为钦州，黄州为峰州，利州为智州，德州为驩州，东甯为融州，上皆从之”。州的治所在钦江县，这是钦州得名之始。甯逵调任安州刺史时年岁已高，但他为甯氏家族开创了在钦州的基业，虽然其势力仅限在安州境内。甯逵何时逝世，不得而知。袭任者是他的长子甯猛力。

甯氏家族势力在岭南的鼎盛时期，是甯猛力和甯长真两代人在世之时，时间约从陈末至唐初武德年间。《甯贇墓志铭》说：“父猛力，（隋）文皇帝除使持节开府同仪同三司安州诸军事，安州刺史、宋寿县开国侯。”但是，《新唐书》却说“陈末，以其帅猛力为甯越郡太守”，与碑文略有出入。《隋书·地理志》：“钦江，旧为宋寿郡。平陈后，郡废。开皇十八年，改为钦江，大业初置甯越郡。”甯猛力是开皇十七年十月（公元597年）死的，其时还没有甯越郡，而《新唐书》却说他曾任甯越郡太守一职是不符合史实的。因此，甯贇和甯道务的两方墓碑铭文中均未提及甯猛力曾任甯越郡太守一职。《新唐书》作史者为什么说甯猛力曾任甯越郡太守呢？估计是作史者以后来之郡县概念附会到甯猛力的身上所致。

甯猛力生、卒于何时，出土的碑文都没有提到，但史籍却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北史·令狐熙传》云：“时有甯猛力者，与陈后主同日生。”《隋书·令狐熙传》也有同样的记载。陈后主就是陈叔宝，是陈朝的末代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不会当皇帝的庸才，但他的诗词却写得很好。著名的《玉树后庭花》就是他创作的，被喻为亡国之音。陈叔宝于至德元年（公元583年）继承皇位。他在位时大建宫室，生活奢侈，日与妃嫔、文臣游宴，制作艳词。隋兵南下时，他自恃长江天险，

不以为意。祯明三年（公元 589 年），隋兵入建康（今江苏南京），他慌忙带着最宠爱的张贵妃、孔贵嫔躲藏在枯井中，被隋兵搜出，俘往洛阳，陈朝遂亡。既然《北史》和《隋书》都说说甯猛力与陈后主“同日生”，其含义与今日所说的“同年同月同日生”相同，因为古汉语简约，说“生陈后主的那一天”，就已经包含着“那一天”所在的年和月。而据《陈书·本纪六》，陈后主生于梁元帝乘圣二年十一月戊寅，即十一月二十日（相当于公元 553 年 12 月 10 日），所以，甯猛力也应该是这一天出生。至于甯猛力死于何时，《资治通鉴》也有明确的记载^[5]，说他死于开皇十七年（公元 597 年）十月，时年 44 岁，可谓英年早逝。

甯猛力在隋朝时与桂州总管令狐熙有过一段可以说是非同寻常的交往。据《北史·令狐熙传》载：“上以岭南夷、越数为反乱，征拜桂州总管十七州诸军事，许以便宜从事，刺史以下官得承制补授。给帐内五百人，赐帛五百匹，发传送其家累，改封武康郡公。熙至部，大弘恩信，其溪洞渠帅更相谓曰：‘前时总管皆以兵威相胁，今者乃以手教相谕，我辈其可违乎？’于是相率归附。先是，州县生梗，长吏多不得之官，寄政于总管府。熙悉遣之，为建城邑，开设学校，华夷感敬，称为大化。时有甯猛力者，与陈后主同日生，自言貌有贵相，在陈日，已据南海。平陈后，高祖因而抚之，即拜安州刺史。然骄傲，恃其阻险，未尝参谒。熙手书谕之，申以交友之分。其母有疾，熙复遣以药物。猛力感之，诣府请谒，不敢为非。”甯猛力出身世族，数代在岭南为官，又凭借岭南地形的险阻而拥兵自重，自然不把北方的官员和朝廷看在眼里，所以“骄傲”，不去参谒令狐熙。厚道的令狐熙没有责怪甯猛力，反而给他写信，“申以交友之分”；不仅如此，令狐熙还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感化甯猛力。甯猛力的母亲得了热病，令狐熙就给他送药。甯猛力是个孝子，所以令狐熙的举动使他深受感动，便亲自到令狐熙的府上拜谒，表示“不敢为非”。令狐熙病逝后，甯猛力也得重病而死。但他实现了自己的诺言，有生之年都老老实实、没有再进行任何叛乱活动。

甯猛力是甯氏家族中最有作为的人物，南北朝时，其在岭南政坛影响颇大。甯猛力在陈末承袭父职安州刺史之后，日筹夜思的一点就是如何拓展辖区扩大范围。陈后主祯明年间（公元 587～公元 589 年），甯猛力派遣他的弟弟甯暄带兵进

驻合浦大廉洞一带，开辟新县，扼住东南沿海。后来陈灭隋兴，隋王朝悉获他已在合浦一带拥兵自重，便任他为合浦太守。隋灭唐兴，唐王朝亦仍任他为合浦太守，继续掌管合浦地方军政事务。武德初，甯暄死，予甯纯袭父职。甯氏家族在隋一代就拥有西至扶绥、南宁，北接玉林，东至博白县，南有北部湾这样东西千余里，南北五百余里，有山、有海、有平原的广大地域，成为岭南举足轻重的地方势力。

甯猛力在世时，在对内方面，他政绩显著，对外方面，我们还没有发现有关他带领部兵与隋王朝军队正面交锋的记载，与周围的首帅也没有发生过战争。正因为如此，辖区内的人们得到休养生息，安居乐业；当地人民尊之若神明。宋人周去非曾任桂州通判，到过钦州讲学，他著有《岭外代答》一书，专门介绍广西风土人情及政事。书中评论甯猛力说：“钦州甯谏议庙，去城数十里。太守到任谒之，雨暘不时，祷之辄应。六朝时有甯猛力，据有其地，隋朝因拜猛力为安州刺史，然恃险骄傲自若也。自令狐熙为桂州总管喻以恩情信，乃诣府请谒。后熙奏改安州为钦州。猛力欲随使者何稠入朝，而死。其子长真葬毕入朝，乃以长真嗣为钦州刺史。唐高祖授长真钦州都督。长真死，子据袭刺史，然则谏议其猛力欤。猛力最有功于钦，钦人即其墓室宅社而稷之，置祭田数顷，诸甯掌之，至今尚存。诸甯今为大姓，每科举曾有荐名者。钦之祀，无非淫祠，惟谏议为正。”

^[6]上段文字说明了几件事：其一，钦州甯谏议庙香火非常旺；人们在他的墓前建有祭殿，并有庙田数顷，由甯氏族人掌管。每当天旱无雨，人们就来到庙中求雨，相传非常灵应。此庙在宋朝时还存在，甯猛力成了保佑一方百姓的社会神。钦州人信仰多神，诸如鬼神、雷神、山神、水神等，都被周去非贬为“淫祀”，唯有甯谏议是正神。其二，甯猛力在钦州最有功绩，因而得到人们的拥戴，凡新到任的太守都要去拜谒。其三，甯谏议庙中祭祀的主神是谁？人们都不清楚。周去非提出，莫非是甯猛力吧？他虽然还有疑问的成分，但肯定的意思是明显的，因为“猛力最有功于钦”，对钦州功劳最大，自然得到钦州人的敬奉。但是，从碑文内容看，甯猛力并没有当过谏议大夫，在甯氏族人中只有唐朝时期的甯原悌当过谏议大夫。估计是甯原悌死后，人们给他建庙以祭祀，时间久了，人们逐渐忘记

甯原悌而将甯猛力当主神祭祀。由此可见甯猛力影响之大。还有另一种推测，也可能甯猛力真的当过谏议大夫，但文献没有记录下来。因为在历史文献中都没有甯猛力的专传，仅在记述别人别事时才提到甯猛力的一些事，自然会有许多遗漏；就是碑文所记，也有一些错漏。

甯猛力死后，其子甯长真袭职。甯长真与甯猛力一样有作为。其才干在某些方面要超过他的父亲。据甯贇墓志说：甯长真与其弟甯贇“南定交趾之川，北靖苍梧之野”。综合史书资料及碑文内容看，甯长真一辈子过的是戎马生活。他不但率领甯氏部兵参加岭南地区各割据集团间的战争，还率兵南打交趾，北征高丽。由于长年征战，没有很好地搞经济建设，又因战争消耗大量的人力和财力，甯氏家族的经济实力受到严重影响。可以说，甯长真时代是甯氏家族强盛时代，同时也是逐渐走下坡路的开始。

第三节 甯氏家族与羁縻制度的关系

自汉代至宋朝，历代中央封建王朝在广西地区设的郡县分为两种，一种是正郡正县，行政长官由汉人担任，为流官制；另一种是羁縻州、县，由原住民族担任行政长官，执行世袭制。隋唐时期的钦州、合浦是正州、正县，由汉人甯氏家族任行政长官。但是从甯氏族家族与中央王朝的关系看，钦州又享受羁縻州的待遇，中央王朝一直都把他们当俚僚酋帅看待，执行世袭制。这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这里首先需要了解隋唐时期在广西设羁縻州县的动因和社会背景。

什么叫“羁縻”？《史记》载道：“盖闻天子之于夷狄也，其义羁縻勿绝而已。”其中的“羁縻勿绝”是什么意思呢？《索隐》引《汉官仪》解释说：“羁，马络头也；縻，牛韁也。《汉官仪》云，‘马云羁，牛云縻，言制四夷如牛马之受羁縻也。’”具体言之，就是中央王朝的统治者将少数民族中的人民群众比作牛和马，给马戴上笼头，给牛牵上缰绳，马、牛就服服帖帖听从指挥了，所以，利用羁縻制度，就可以对少数民族进行统治，使他们臣服于王朝。这种方式，在汉代便称为“羁縻”。那么，谁来充当马笼头（羁）和牛缰绳（縻）呢？是少数民族的首领分子。而抓住马笼头和牛缰绳不让马和牛跑掉的人则是中央王朝的统治者。中央王朝怎样才能抓住马笼头和牛缰绳？就是朝廷封授给少数民族首领一个

职官称号，仍由他们世袭其地，世长其民，朝廷不过问不干涉其内部事务；允许保留其原来的社会、政治形态，只要求他们表示臣服，象征性地“纳贡”而已。如果他们不服，中央王朝就派兵加以征讨，直到他们服帖为止。由此不难窥见羁縻之治的实质及其主要内容。

同其他事物一样，羁縻制也有其产生和不断完善的发展过程。开始时，它还比较粗糙、松散。只不过是对少数民族略加管束，笼络各民族酋首、渠帅，使之不生异心叛离而已，不求深治。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中央王朝统治势力的逐步深入和加强，对民族地区的政策措施日趋完善，羁縻制也就随之逐渐完备、强化，至唐代时便形成了颇为完备的治理周边民族地区的一种政治制度，并广为推行实施。《新唐书·地理志七下》“羁縻州”条说：“唐兴，初未暇于四夷，自太宗平突厥，西北诸蕃及蛮夷稍稍内属，即其部落列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虽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然声教所暨，皆边州都督、都护所领，著于令式。”这是羁縻州制的形成过程及主要内容的集中概括。

综观唐王朝在岭南实行羁縻制度的基本内容，一为“全其部落，二为“不革其俗”，三为轻徭薄赋，四为“以蛮治蛮”取代历朝的流土并治。比较秦汉以降历代而言，前三者基本属继承性，而后者则可谓是唐时边疆民族治理思想的重大发展，在羁縻州县重用土酋自治，是羁縻制的核心，是唐代较之历代王朝在政治上更为开明进步的重大表现，是唐王朝对民族问题存在较少民族偏见在政策上的重大表现。通过羁縻制度的施行，唐王朝把壮族先民地区统一在中国版图内，在保留壮族先民内部原有的政治、经济结构不变的情况下，又从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施以影响。对于社会发展落后于内地的壮族先民来说，这种统一对其社会发展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是有利的。而其对边疆的稳定，对边疆民族内部凝聚力的增强，从而对国家的稳定作用则愈见明显。

历史事实说明，羁縻制度的出现和推行，并非出自某王朝或某个统治者的主观愿望，而是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中央王朝适应当地社会和民族情况的施治，有其产生、发展和存在的充分理由与合理因素。毋庸讳言，历

史上没有一个中央王朝不想在其统治区域内划一制度，在民族地区也推行郡县流官制；也没有任何一个王朝的统治者不想派自己的官员到民族地区进行直接统治。但实际情况是非所不欲，实不能为也。这是封建中央王朝推行羁縻制度的历史原因所在。

羁縻制度的出现和推行，对地方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民族地区同中央王朝的关系，对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与巩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对后世治理民族地区也都起过借鉴的作用，至宋元时发展成为更加制度化的土司制度。尽管这些制度在不断地完善和强化，但它们的实质都是中央王朝对民族地区进行间接统治、推行“以夷制夷”政策的产物。

从羁縻州县与正州正县的区别来看，甯氏家族统辖的钦州更像是羁縻州的性质。

首先表现在长官任职的区别方面。一般来说，羁縻州、县的行政长官均由原部落酋首充任，并允许世袭其官，世领其土，世统其民，即“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自然，各部落首领不能擅自立为王侯，更不能自封为都督、刺史、县令。他们的官衔职务和名号爵位，均由朝廷册封和承认方为有效，否则就是非法的，并受到惩罚。他们被授封之后，便作为唐朝的地方官员统领部众，其职责是“敬慎王猷，抚甯部众”；“长保忠信，效节本朝”；“长奉正朔”；“远输诚节，修职贡之礼”；“慎守封疆”；“永保藩辅”；“永为藩属”。否则就被讨伐、取缔。这些羁縻州受边州都督府、都护府的直接统领管辖，还要听命于中央王朝。而一般州县的行政长官由朝廷直接任命，有任期，职位不能世袭，属于流动官员，朝廷可以随时调任他职易处。正州直接受中央朝廷统辖管理。

甯氏家族从甯逵到甯猛力、甯长真、甯璩共四代，都是世袭刺史，合浦郡太守甯暄、甯纯也是父子相承。直到唐中期以后，甯氏才不再世袭。就此而言，隋唐王朝给甯氏的政策是羁縻州、县的世袭政策。

其次在赋税方面，甯氏家族也享受羁縻州、县的待遇。羁縻州的居民一般不直接向国家缴纳赋税，其原因是羁縻地区由于其社会发展较正州地区落后，这里不存在封建地主与自耕农的土地所有制，因而国家也就无从向居民直接征收固定

的赋税，而只要求土长们进呈少量的方物土产。《新唐书·地理七上》载：“钦州甯越郡，土贡：金、银、翠羽、高良姜。”这种纳贡的性质，从政治上说是臣服隶属的标志；从经济上讲是赋税的形式，更是中原与边地贸易交换的特殊形式，也可以说是边地民族首领与中央王朝的一种物物交易。因为每次进贡，朝廷都给予较贡品多的赏赐；一支庞大的贡使就是一支商队。而一般州县的民户需直接向国家缴纳赋税，州县长官无纳贡的规定与义务。羁縻州县的“贡赋版籍”虽“多不上户部”，但还是要向所属的都督府或都护府缴纳一定数量的赋税。“若岭南诸州则税米，上户一石二斗，次户八斗，下户六斗。若夷獠之户，皆从半输。”可见羁縻地区的居民也是要纳税的，只是较正州居民轻一些。其方式可能是由酋长们从其剥削中拿出一部分统一解送。唐行租、庸、调之法，以丁为本，但“岭南诸州，则以户计”，以户计自然比正州以丁计为本的负担要轻一些。

最后，在拥有武装力量方面，甯氏家族的部兵更具有羁縻州的性质，而与正州差别很大。按隋唐中央王朝规定，羁縻州长可拥有本部族武装力量。土属兵马数量不受限制，可任其自由发展。但王朝有硬性规定：土属武装除在本地“慎守封疆”外，不得擅自行动，必须听从王朝或都督、都护的调遣，为王朝服务。为了调动羁縻地区的土属兵马，唐中央朝廷专设有征“发番国兵”的“天子信宝”，对羁縻地方还给予印契，“以为征发符信”。各羁縻当局都有义务出兵并以军用物资协助唐朝中央政府或都督节度使在边疆地区的军事行动，而当一些羁縻地方受到他族侵扰时，唐王朝有出兵保护的义务。唐朝廷在边疆地区的每一次军事行动，几乎都有土兵奉调协同作战，如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西原蛮”“作乱”时，王朝进行镇压，并调黔州士兵去支援。可见羁縻地方虽可保有本部武装力量，但受到唐朝政府的管辖征调，在这个意义上说，同属王朝的工具。而一般州县则不能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就此而言，羁縻地方武装实际上是民族武装。

甯氏家族长期拥有一支实力非常强的俚僚部兵，其中有水军和陆军。究竟甯氏家族的俚僚部兵数量有多少？文献中没有记载具体的数字。《新唐书》载：甯长真“又率部落数千从征辽东”。由此推测，甯氏家族的俚僚部兵约有5000人马。这支部兵属于甯氏家族的私有武装，曾在甯长真率领下南征林邑、交州，北伐高

丽，战斗力很强。拥有这样实力的武装部兵，在其他正州中是绝对不允许的。由此表明，甯氏族家族在武装配备方面享有羁縻州的待遇。

甯氏族是汉人，又在正州中任刺史，为什么在武装配备、缴纳赋税、长官任职等方面享有羁縻州的自治权力？这需要从甯氏族辖地的民族结构来作具体分析。

隋朝初期钦州辖地只有钦江、安京、内亭3个县，范围很小。这3个县原来也是俚僚人聚居的地方。隋至唐初，这里是流放之地，凡中央皇室及朝廷命官犯罪者，有相当部分人都流放到钦州。随着汉人的逐渐增多，他们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汉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里的社会结构和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钦州被划为正州。而实际上，在正州的背后，却是俚僚人酋帅仍拥有很大的实力，汉人只是住在城镇内，城郊以外的广大地区仍是俚僚人的聚落，各部落酋长仍拥有自己的武装，这是当时无法改变的。后来甯族人又开辟了12个新县，分别为南宾、遵化、大廉、蔡龙、东罗、安昌、高平、大都、临江、鹤山、宏波、零远县。这些新县在隋唐以前都没有编籍入户，可以说是化外之民。开辟成新县之后皆隶属钦州管辖。如果按正州来对待他们，显然是行不通的。如这些新县的部落酋长都世代相袭了，并拥有部落武装，突然剥夺他们的权力，必然引起动乱，造成社会不稳定。又如赋税问题，这些新县本来生产力就落后，如果按正州征纳赋税，将造成当地俚僚人的生活贫困，他们也就脱离中央王朝的统治。因此，只能依其故俗，待到条件成熟后才能改造他们的社会结构。甯氏族是钦州的行政长官，既然辖区内绝大部分县都属羁縻性质，他们也就享有同等待遇了。这是隋唐时期中央王朝在边疆民族地区采取灵活的民族政策，总执行这种民族政策的都是甯氏族。

至于世袭问题，也与周围的俚僚势力有关，还与中央王朝的需要密切相关。因为甯氏族是在俚僚人的自然和人文环境中生活的，如果没有世袭的官职，他们就不可能在俚僚地区长期生活下去。

隋唐时期中央王朝对甯氏施行的羁縻制度，还为后来的土司制度的制定和实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点在后面的“结束语”部分再展开来谈。

第四节 甯氏家族在钦州的文化遗存

由于年代久远，甯氏家族遗留下来的文化遗存很少，目前所见的是钦州久隆隋唐甯氏家族墓地和甯原悌的一些活动遗迹。下面分别介绍。

一、久隆甯氏家族墓地

广西钦州久隆甯氏家族墓地的发现是广西隋唐考古的重要收获。1976~1977年，鉴于钦州市久隆、平吉镇历年来陆续发现不少隋唐时期的文物，广西文物工作队（现改为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与钦州县文化馆在这两地范围内进行了文物考古调查和钻探工作，共在久隆乡的新圩、青草、新明、高营以及平吉乡的古龙、独竹等地发现古墓葬 30 余处，其中以久隆乡的青草、新明最为集中。这些古墓葬，除古龙、独竹的墓葬坐落于钦江西岸外，其余均分布在钦江以东新明江以西的大雾岭东麓。



图 2-1 钦州久隆古墓群保护标志

钦州位于广西南部，南临北部湾，西接防城、上思，隔海与越南相望，北连邕宁、灵山，东邻合浦，位于钦江下游钦州湾沿岸，自古以来都是我国南疆边陲重镇。久隆镇位于钦州东北约 18 公里。久隆镇北边为平吉镇，东部为大雾岭，古墓葬分布聚集在大雾岭的东部地带，北起久隆的平心村，南至新明的石狗坪（又称七星坪），绵延达 10 公里。大雾山，又叫大墓山或大帽山，或上蒙村上蒙岭。虽称谓不同，但说的都是一个地方。

关于这一带的墓葬，1936 年版的《钦县志》曾有记载：“隋正议大夫甯贇墓，在城东三十里石狗坪”，“清道光六年（公元 1826 年）秋，州人耕于石狗坪获此

碑。碑额十二字四行，分列于首，下方为书文。文楷书三十行，行三十九字，末际损一角”，“清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土人复于石狗坪犁田寻获一角”；“唐刺史甯道务墓，在城东七十里平心圩山麓”，“是墓发现于民国九年（公元1920年），因有平心村农李士花遇一巨足虫入斜坡小穴，掘穴发现逍遥大雅之堂冢。冢分前后两座，左右各四室，皆通以圆拱门，用长方扁砖筑成，下铺十字格花纹正方砖。前座方砖面正置陶制墓志碑”；“唐谏议大夫甯原悌墓在城东北三十里大墓山”；“又有甯公墓在县东六十里鸡灵石”，“又再有甯公墓葬，一在平吉那隆坪，一在平吉独竹岭”。

从上述记载中可知，钦州大雾岭甯氏家族墓群在宋以前由于没有受到大的破坏，宋代周去非还说甯谏议的墓葬和庙在一起，香火很旺，历任太守都去祭拜，应当说甯氏家族的墓地得到很好的保护。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明朝末年。明末清初，甯氏家族墓地才遭到大面积的破坏，个中原因是当地人口增多，在墓区内大量垦荒引起的。明朝嘉靖以前，钦州一带还是地广人稀，草木遍野，猛兽横行之地。明朝嘉靖十五年（公元1536年）七月任钦州知州的林希元说：“臣始入州境，陆行三日，始抵州城，见平原旷野，高可种黍，下可种稻，皆为荒野，成田者十仅有二，所种仅水稻一种，黍、稷、麻、麦俱无。”汉族移民沿西江而上，逐步进入钦州地区，他们开垦荒地种植稻黍，建立村落，定居下来。随着入居钦州的汉族的不断增多及人口繁衍，临近江河水源的平垌地带被大量开发。汉族族谱中都记载有其先祖从外地迁居钦州拓荒耕种、定居繁衍的历史。如1996年编的《李氏族谱》说：旧州那浪塘、竹山、上垌三村的李姓人，祖居广东程乡县龙牙村，明末由潮来灵，因见山明水秀土沃田美，遂开基于上垌、那浪塘、竹山等村。甯氏家族自然也编有自己的族谱。

甯氏家族墓葬地表上原来都有高大的封土堆，因为垦荒种地，绝大部分的封土堆已被推平。封土堆是保护墓室的重要设施，因为在封土堆下面是用砖块筑成的拱形顶墓室。如果没有封土堆保护，雨水就容易渗漏至墓室中，造成坍塌；加上农人常年在墓室上犁地耕种，重力和震力会直接影响到墓室的安全。坍塌了的墓室，在地表就可以看到下坍的洞穴。甯贇墓和甯道务墓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被

发现的。那个名叫李士花的农民就是因为追逐一条巨足小虫钻进一个斜坡穴洞内而发现并打开了甯道务的墓门。

甯氏家族墓地有多少座墓？目前还不能作出准确的回答。1976~1977年，广西文物工作队进行了较大规模的钻探，发现了30余座墓。由于当时受到经费和时间的限制，只钻探了部分面积。如果将大雾山所有墓地钻探完，估计也有百余座墓。可以说大雾岭就是甯氏的族坟墓地，相信所有甯氏家族的人，不论贵贱，死后都会埋葬在这里。从目前所掌握的资料分析，族坟墓内还是有等级差别的。比如甯贇墓和甯道务墓都有墓志铭，1976~1977年间发掘的7座墓则都没有，其中的七号墓南部约300米就是甯贇墓。据此可知，凡是墓葬主人生前是朝廷命官的，墓葬内就陪葬有墓志铭，而普通百姓就没有这种资格。所以，墓志铭成了身份地位的象征。

甯贇墓和甯道务墓的结构和陪葬习俗，因为不是经过考古工作者的科学发掘，再加上年代久远，具体情况不甚清楚。但从1976~1977年发掘的7座墓来看，葬制和葬俗以汉文化为主流，没有发现当地少数民族的文化元素。如墓葬形制是流行的凸字形或其变形的砖室墓；三平一竖的砌砖方法及墓底铺人字形地砖；随葬品以青瓷器、陶器为主，盛行四系罐、青瓷碗、青瓷杯等器物，胎体厚重，敞口，小假圈足，釉肥厚，青中泛黄，细开片纹易脱落，施护脱釉等。这些都是广东、江西、江苏、浙江等汉族地区南朝时期墓葬的风格，但墓室多设置壁龕、灯龕、排水沟等，又具有隋朝和唐朝初期风格。这些都是汉文化的特点，与当地少数民族的埋葬习俗有明显区别。

最耐人寻味的是第4号墓和第5号墓。两墓穴相距得很近，墓的形式是双室平行，大小相等，两室间隔墙前都设有券拱式过道相通，墓葬底作成两级，前级稍低，均铺人字形地砖。随葬品置放在墓室前端，以陶瓷器为主，有少量金属器。器物有四系罐、碗、盂等陶瓷器和铜镜、五铢钱、铁刀、铁剑、铁锅和金碧辉煌的发钗等。两墓室中分别陪葬有半边铜镜12件，左室的铜镜面朝上，右室的铜镜面朝下。考古工作者将两墓随葬的半边铜镜相对拼接，发现它们原来是完整的12件生肖铜镜。这说明这12件生肖铜镜原来都是完好的，在埋葬时才有将它

们折成两半。这通常是夫妻合葬特有的葬俗，一半陪葬丈夫，一半陪葬妻子。所以，这两个墓其实是夫妻合葬墓。从两墓的铜镜镜面朝向来看，左室的镜面朝上，表示阳，应是丈夫墓；右室的铜镜面朝下，表示阴，应是妻子墓。阴阳结合就是夫妻。这些陪葬现象，至少隐喻着两层传统的汉族文化意念：一是“男左女右”，二是“破镜重圆”。这只有从北方来的汉人，并且具有较深汉文化修养的人才能在墓葬中有如此用心良苦的意念。为了认识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对“男左女右”，“破镜重圆”的源流作简单介绍，目的是从一个侧面了解甯氏家族的思想意识及其文化意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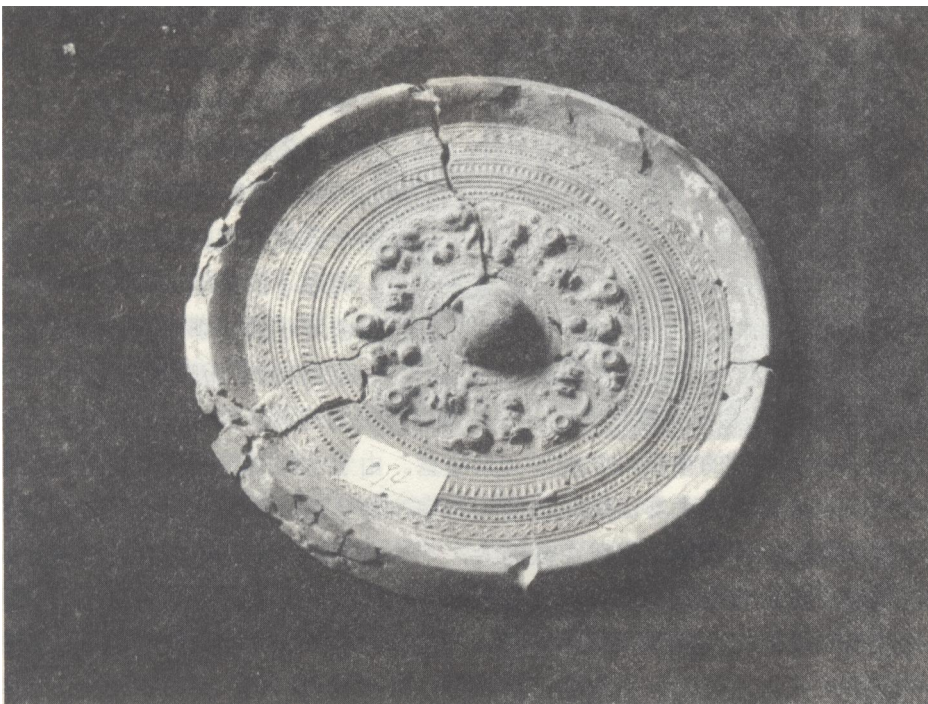


图 2-2 甯氏墓出土的铜镜

何谓“男左女右”？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男左女右”在很多场合已成为约定俗成的戒律。厕所是男左女右；戴婚戒，男左女右；照结婚玉照，也是男左女右。另外，如果夫妻二人出席某些礼仪场合，也还是男的在左边，女的在右边。如果颠倒了位置，就会有人笑话，说是违反了传统的习俗。这种习俗来源于盘古神话传说，并经道教徒渲染，最后变成汉文化中的戒律。三国吴人徐整在《五运历年记》载：“元气鸿蒙，萌芽滋始，遂分天地，肇立乾坤，启阴感阳，分布元气，乃孕中和，是为人也。首生盘古，垂死化生。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理，肌肉为田土，发髭为星辰，皮毛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泽，身之诸虫，

因风所感，化为黎虬。”[7]这是盘古“垂死化生创世”类型的神话。文中说盘古死后，左眼化为太阳，右眼化成月亮，在古人思想意识中，太阳能量大，所谓万物生长靠太阳，人们的日常生活离不开太阳，因而太阳处于尊崇地位，太阳是盘古神左眼化成，于是左边位置也就受到特别尊崇。这种思想意识用到人际关系中，就出现了君为左，臣为右；父为左，子为右；男为左，女为右，总之是尊左为贵。甯氏家族夫妻合葬墓中，左为男，右为女，左边墓室的半边铜镜面向上是为阳，右边墓室半边铜镜面向下是为阴，以左为尊，都是汉族传统文化的具体反映。

“破镜重圆”也是汉族传统文化内容之一，多用于男女恋爱关系。人们不仅在婚礼过程中强调用镜，即使在日常社会生活中表示婚恋关系时，也常用到镜。从古至今，人们都广泛地以镜为恋爱婚姻的信物，以此表达双方真挚的情感。汉代有一种铜镜，在汉墓中时有见到，其背有铭文：“见日之光，长毋相忘。”考古学中称为“日光镜”。铭文内容表明汉代社会中已用镜子作男女间爱情的标记，相互赠送，作为纪念。有些“日光镜”的铭文分成两圈，内圈是“见日之光，天下大明，千秋万世，长毋相忘，宜侯王”；外圈为“清银铅华以为镜，丝组为纪以为信，清光明乎服春，富贵番昌，镜辟不洋”。其中把“毋相忘”的婚恋用语与“丝组为纪以为信”结合起来，正表明此信物专门是男女爱情的信物或象征。

幸福美满的爱情应该是用完好无缺的圆镜作为象征，而甯氏家族的墓中却用破镜陪葬，这是为什么呢？这和古人灵魂不灭的思想意识有密切关系。人们认为肉体是阳间的，人死后肉体也就破碎了，但人死不是真死，他们的灵魂仍然在另外的世界活着。恩爱的夫妻更希望在阴间世界继续过着阳间的生活。但现实生活是，夫妻不可能同日同时死，后死者如何到陌生的阴间世界寻找先死的丈夫或妻子？必须要有信物，这就是半边铜镜。在人们的意念中，只要后死者拿着半边铜镜去到阴间，与先死的对象手执的另一半铜镜拼接上，夫妻即可团圆，这就是破镜重圆了。甯氏家族精于此理，因此在墓葬中用12件破镜陪葬，这是在全国各地同时代墓中发现最多的破镜陪葬实例。

这种蕴含着“破镜重圆”的葬俗，在我国其他地方也有考古发现。在陕西安塞县王家湾发现汉墓中出土有王莽时期的钱币和汉中期的陶器及一件昭明铜镜，

铜镜出土时分为两半，一半放置于男主人头边，一半放置于女主人头边。江西发现的北宋墓中，也有铜镜出土时分为两半。男女棺内各放置一半，合成正方‘亚’字形。名为‘连钱亚字镜’”。安徽繁昌县老坝冲宋墓中，一些铜镜陪葬时有意敲碎，残存一半，这可能表示夫妇中的一方去世了，另一方尚健在，并未入葬，故而镜缺不圆。

中国人的生命观是由原始人对死亡的关注、追问而产生的，即真正的人类意识是因认识到死亡而生的。从中国古代葬礼祭祀等活动中，我们又可看出人类对死亡忧患的化解。因此，葬俗中用镜陪葬，表面上看是重视死亡，实则也是为了追求永恒之生。人类用以与死亡对抗的东西就是对生命不可征服、不可毁灭的坚定信念。而用破镜陪葬则进一步表明对爱情的永恒追求。

二、甯原悌文化遗迹

谏议楼当地群众传说是谏议大夫甯原悌读书的地方。在钦州市板城镇众仁村旁的众仁岭上。该岭因紧靠琅济村，因而前人多称琅济山或狼济山。此事史书多有记述。《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载：“狼济山，甯原悌读书之所，有石室，石门外有石桥，两石人夹峙其上。”据考察，这是一个处在海拔300多米高的天然小山洞。南向，洞高1.8米，深2.8米，宽4.2米，面积不足8平方米，内有石台、石凳，石质莹润如玉，石面平滑如镜，确似有人住过的痕迹。奇怪的是，这些石台石凳虽经历1000多年，却是一尘不染，似是有人经常抹拭似的。洞口凉风习习，洞下万丈深渊，悬崖如削，进出须从后面绕道而上，经一道天桥，桥高8米，深8米，稍有不慎，即可粉身碎骨。虽然出入困难，但地方幽雅舒适，确是古人理想的读书之处。

驾马岭传说是甯原悌读书后练习跑马的地方。位于板城镇东部，距板城4公里的那棉垌农业中学一直延伸到众仁岭，紧连着甯原悌读书的谏议楼石洞遗址。虽跨越十余公里，连接数十座山头，但山顶平直如道，远望似天道凌空，实属奇迹。

谏议井位于钦州市青塘镇东北高峰村上。相传是谏议大夫甯原悌饮用的水井。当年甯原悌曾有一把莲花扇掉到井中，井内水影似有莲花，因而也叫莲花井，

井口呈一米的正方形，深 1.58 米，全用花岗岩石块砌成。井的三面是水田，一面靠公路，该井水清味美，终年泉水不竭，深为群众喜爱，目前保存完好。



图 2-3 甯原悌墓墓碑

谏议墓唐朝谏议大夫甯原悌的墓地，很多史书都有记载。或大墓山，或大雾山，或大帽山。而甯氏族谱记载的则是上蒙村上蒙岭。据初步考证，虽山名不同，但地点是一致的。即其族谱指出的“由钦往廉三十华里的分界坪上蒙岭”。墓为同治二年重修，作覆釜形，灰沙三合土结构，墓上刻“唐谏议大夫甯原悌”。目前保存完好。

[1] 《新唐书》卷 47 志，地理 7。

[2] 《旧唐书》卷 45，地理 4。

[3] 广西壮族自治区通志馆编：《二十史广西资料辑录》二，461 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 年。

[4] 详见胡阿祥：《侨置的源流与东晋南朝侨州郡县的产生》，刊于郑州大学历史学院编《高敏先生八十华诞纪念文集》，线装书局，2006 年。

[5] （宋）周去非：《资治通鉴》卷 178。

[6] （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 10。

[7] 引见茅盾：《中国神话 ABC》，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